



陶行知教育改革思想研究

TAOXINGZHI

JIAOYU GAIGE SIXIANG YANJIU

梁晓凤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陶行知教育改革思想研究

TAOXINGZHI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陶行知教育改革思想研究/梁晓凤著.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81140-066-3

I. 陶… II. 梁… III. 陶行知(1891~1946)—教育改革—教育思想—研究 IV. G40-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4084 号

陶行知教育改革思想研究

梁晓凤 著

责任编辑 任晓燕

封面设计 刘 韵

责任印制 汪 俊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49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823703,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广育多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77 千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40-066-3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804227

PREFACE 前言

作为杰出的教育思想家，陶行知为拯救中国而改造旧教育，在中国本土教育实践中创立了与僵化的传统教育观截然不同的新的教育理论——生活教育理论。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根本主张就是：“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社会即学校”，等等。这些理论并不深奥，陶行知只是归纳出全人类生活进程中的ABC，这也是人类教育历程真相之说明。即使是村妇和牧童也能知能行，正是陶行知还了教育一个本来面目。

中国自周朝以来，就推行读书为做官的学校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后来定格在隋文帝开皇三年（583）科举制度的确立。从此以后，中国成千上万的精英学子们被皇上的诱饵所惑走上了漫漫仕途。陶行知说：“等到八股发达到极点，朱注的‘四书’被拥护上天的时候——至此，中国的知识真正濒于破产了。”什么是传统教育？陶行知概括为“用旧观念来看，教育就是读书”。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教育造就出无数浅陋无能的文人，把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古国变成了“文盲”大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老八股”演变为“洋八股”，不论“老八股”还是“洋八股”，都与民众生活无关，仍然是“干禄教育”，读书人追求的还是个人的荣华富贵、升官发财。

在急风暴雨、战火纷飞的年代，陶行知寻求拯救中国的教育理论与方法，建立了独特的生活教育理论与方法。陶行知

最突出的贡献是要我们创造性地独立思考教育问题。

教育究竟是什么？

教育可以是麻痹人民的工具，也可以成为人类解放的武器；教育可以为小众服务，是小姐的金刚钻戒指、阔少爷的手杖和政客升官的梯子，也可以为大众服务，成为冰天雪地中穷人的窝窝头和破棉袄。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把教育从小众手里夺来，变成了大众为谋取自己的解放、民族的解放的有力武器。陶行知是中国第一个打破传统教育并创建新教育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传统教育是小众教育。他指出，“传统教育是变人为少爷、小姐、书呆子的教育，也就是一种亡国的教育”，“传统教育不能普及，也不可能普及”。如果要把传统教育普及开，陶行知风趣地说，我们的国家就会变成一个少爷、小姐、政客和书呆子的共和国，真要不打自倒了。

有人片面地认为，教育不就是读读书嘛！只要书读得好，考一个好大学，将来就能够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或者找到一份好工作。但问题是，目前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尽管我国高等学校每年扩招，但能够进入大学之门的毕竟还是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大多数学生中学毕业就不得不走向社会。即使对那些有幸考入大学的学生而言，毕业以后能够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或者找一份好工作，也变得越来越艰难，甚至连谋生的基本技能都没有。“毕业意味着失业”、“（工作）找得好不如嫁得好”成为对我国传统教育的绝佳诠释。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们的教育改革步履艰难，教育方向越纠越偏，学生负担越减越重，以至于造成学生厌学、自杀，甚至走上犯罪道路。为什么？党的教育方针应该说是明确的，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原因何在？我们的教育究竟在培养什么样的人？社会主义教育应该是什么样

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支撑社会主义大业？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建立在传统教育基础上，最后的结果为什么竟会是这样？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我们学习和研究陶行知及其教育改革思想，绝不是只为了写几篇论文，而是根据目前中国传统教育的残酷现实，寻求解决我国教育问题的思路、途径与方法。应该说，对于我国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给我们提供满意的解决方案，他们都只能在某些问题上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或启发。因为：

第一，传统教育是世界性的，外国也有；但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创建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教育制度。

第二，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是一个超级读书大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还不太富裕，要想使近 14 亿人民都富裕起来，都能平等地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就必须把亿万读书人的聪明天赋引向正确的道路，使他们个个成为能思索能建设，脑指挥手，手发展脑，手脑并用的劳动者。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才优势，我们就必须把这样的教育制度研究出来，这种教育无从抄袭。

陶行知历来主张“中国教育应求其‘中国化’也”（第 11 卷，第 489 页）^①。“我们穷人办教育。样样都得带点创造性。”（第 12 卷，第 771 页）陶行知之所以伟大，在于他披荆斩棘在中国第一次打破陈腐的传统教育，在本土教育改造的实践中，创造出未曾有过的崭新的教育理论。这个教育理论不是虚构的，也不是从外国抄袭来的，它具有实践性、科学性、革命性和超前性。由于陶行知的教育理论是坚定地为人民

① 书中引文如不作特别说明，均引自四川教育出版社的《陶行知全集》。其中，第 1—10 卷为 1991 年版，第 11 卷为 1998 年版，第 12 卷为 2002 年版。

大众服务的，因此他的教育理念便具有了前瞻性，对于当今中国教育的改革实践仍有指导意义。

所以，笔者认为，运用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与经验，来观察分析中国当今教育存在的问题，以及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把握发展的方向，可以说是一个有力的武器。陶行知不愧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伟大的教育思想家、伟大的爱国者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我们中国近百年来少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

陶行知的学说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陶行知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他的学说不仅对中国也是对世界的贡献，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发展教育，提高人民生活水准。陶行知伟大的博爱思想，拥抱着全世界的劳苦大众，他的教育思想字字句句无不瞄准着大众的幸福。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一批陶学研究的学者、专家和教授。

通过研究陶行知，我们能深刻理解究竟什么是教育，教育是人民大众、民族以及人类解放的工具，而不是玩具、装饰品。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研究陶行知及其教育改革思想才具有价值。最后，还需指出的是，陶行知的学说是革命的教育学说，和其他许多教育理论是根本不同的，陶行知不是对现存教育制度的改良或修修补补，而是从根本上加以改造。

限于篇幅，更限于个人的水平，本书难免有论述不周之处，敬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梁晓凤

2009年5月于杭州师范大学

CONTENTS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陶行知教育思想探源	47
第一节 陶行知教育思想发展的五个阶段	49
第二节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	57
第三节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66
第二章 陶行知的大众普及教育思想	75
第一节 普及教育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	77
第二节 陶行知的普及教育理论与方法	96
第三章 陶行知教育创新思想及启示	109
第一节 陶行知的教育创新思想	111
第二节 陶行知教育创新思想的启示	122
第四章 陶行知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	131
第一节 陶行知对师范教育改革的思考	133
第二节 陶行知师范教育改革的现代价值	144
第三节 陶行知对传统大学教育改革的探索	151

第四节	陶行知的职业教育改革思想	160
第五节	晓庄:教学做合一的教育实践	169
第六节	育才:生活教育的实验学校	177
第五章	陶行知论治学与做人之理念	187
第一节	陶行知论读书与读书人	189
第二节	陶行知论读书人与用书人	198
第三节	陶行知辨真知识与伪知识	211
后 记		231

绪论



在今天,大多数人都以为教育就是读书,上小学是读书,上中学是读书,上了大学还是读书。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过去有 4.5 亿同胞,今天已经是近 14 亿人口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读书大国,今天更是一个超级读书大国了。读书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人生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特别是青少年,读书几乎占用了他们的全部时间,甚至侵占了他们的睡眠时间,影响了他们必要的运动与休闲,使他们长年累月生活在紧张与焦虑之中,饱受读书之苦。

读书不好吗?读书还有什么讲究吗?

在生活教育里,只有“用书”的概念,没有“读书”的概念。陶行知历来反对“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提倡“用活书、活用书、用书活”,在生活教育中,书是有地位的,而且看重它。但正如陶行知所说:“虽然我们重视书籍,把它们作为帮助我们了解过去及当代文明的重要手段,但是,我们怀疑,是否光读书就能使我们获得自由;是否只有读书,才是赏识书。”(第 6 卷,第 387 页)

1935 年 6 月,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兼教育科主任的张耀翔^①,针对陶行知提出的传统教育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

① 张耀翔(1893—1964),湖北汉口(今武汉)人,1915 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0 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硕士学位。中国心理学会会长、中国第一本心理学杂志总编。曾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大学、暨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为最早将欧美心理学输入中国的学者之一。

死”的论点，与陶行知展开了一场辩论。张耀翔在《教育杂志》发表短评说：“我以为如承认读书是件好事，正不如多读……书不像食物，吸收多了会停滞的；倒很像货财，多多益善。”

陶行知回应道：“这是多么精彩的一段读书发财论！我肥天下瘦，我智天下愚，本来是同一个人导演出来的两出悲剧。”

张耀翔又说：“假若有人无需为目前个人衣食而劳作，致全力于读书，不管他是为求学或为消遣，我们都不应非议他。”

陶行知回答：“请问这位致全力于读书的先生的衣从何来？食从何来？正当大众吃树皮草根的时候，读书人还以‘致全力于读书’为消遣，还不许人非议。”陶行知引用了《水浒》第十六回中，由白日鼠白胜所唱的两句诗：

农夫心内如汤煮，
公子王孙把扇摇。

反问道：“我们看到这两句诗，再看看张先生的言论，当作何感想？”陶行知又问：“只吃桑叶而不肯吐丝的蚕，谁愿养？”“书呆子是社会的名称，不是科学上的名称。”张耀翔为书呆子辩护。

陶行知说：“书呆子是个什么人？我就用张先生的话来答复：书呆子是一个致全力于读书的人。他除读书以外，不做别的工作。爸爸病了他不管，妈妈没有米下锅他不管，穷孩子不能上学他不管，邻居失火他不管，田里大旱他不管，逃荒的人吃树皮草根他不管，黄河决口他不管，甚至于日本夺了东三省，打到了上海都不管。管是管的，《本草纲目》、《孝经》、《齐民要术》、教育统计、水灾报告、‘九一八’和‘一·二八’的历史，哪一样不是读得熟透了吗？然而麻木不仁！这种麻木不仁的人，还不是和呆子差不多？还不要想个法子来为他们诊治诊治吗？”

张耀翔也认为，读书读得太多，把性命送掉，这确是“读书死”。对于“读书死”，陶行知有着更深刻的认识。陶行知说：“我们对于‘读书死’的认识，决不停止在个人的死活上。拼命读书，始而近视，继而驼背，终而吐血以至夭折。这种狭义的死，固然令人为他可惜，但是更可惜的是未死之前，整个生活之残废麻醉，失却人生、社会的正确意义。只管读书，不管父母死活而父母死；只管读书，不顾民族死活而民族死。这样小己纵然读书成名，升官发财，而袖手坐看大己枯萎，我们要不称他为读书死也不行了。”

张耀翔一直要为“书呆子”辩护到底，说：“嗜书者好沉默，因为他时刻在思想；不爱参加其他活动，因为他已经得着最高等、最愉快之活动。”陶行知说，张耀翔的这几句话真是一个有闲的书呆子的小影，画得不错，书呆子把书当做鸦片吸上了瘾。这几句话中，唯一缺点是“思想”二字宜改为“呆想”或“空想”。

张耀翔又说：“犁耕是劳动，笔耕也是劳动。”

陶行知回答说：“不错，‘犁耕是劳动，笔耕也是劳动’。但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时代是过去了。我们必须问为什么耕？种的什么？不管是犁耕也好，笔耕也好，而种出来的东西都是麻醉人的大烟，那么，虽能愉快一时，前途怎么办呢？”（第3卷，第347页）

张耀翔为何如此执著地为“书呆子”辩护？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原来“张先生误认读书与求知为一件事”。这是千百年来僵化的传统教育给人们造成的一个极大的认识误区，这个问题陶行知从青年时代就已开始深入思考与观察过了。陶行知回答说：“用书只是追求已经发现的知识的一种方法。用书虽然重要，但是如果以书本为一切知识之来源，那就难免坐井观天了。”

这是七十余年前的一场争论。虽是一场小争论，却涉及中国教育改造的诸多根本问题。30年代的陶行知正忙于为救国事业奔走呼吁，但张耀翔提到的正是根本问题，所以陶行知写了一篇短文《通不通》，以作答复。

从这个争论中可以看出，中国的读书人，甚至像张耀翔那样的教育家也不明白读书是怎么回事，所以对陶行知反对“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提出异议，尤其是对“读书死”的后果没有想到有如此严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是读书界普遍存在的现象，直到今天还存在。之所以有这些错误的认识，根本的原因在于“误认读书与求知为一件事”，并把读书当做升官发财的阶梯，这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传统的错误教育观念。

一、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

（一）什么是传统教育？

“传统”二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在陶行知看来传统教育的这个“传统”特点说来也简单，就是“读死书”三字。其实，读书并不坏，问题在读什么书，怎样读？中国早在周代就建立起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相结合的制度：国家的管理人才从学校教育中来，学校教育为培养国家管理人才服务。“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就是对这种制度最简明的概括。

至两汉时期，实行“察举”——由地方官员察访人才，向朝廷举荐的办法。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汉武帝即位，下诏全国察举。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成为唯一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学说，成为历代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儒家思想也就成了熔铸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的最基本材料。

隋文帝杨坚结束了魏晋以来四百多年的分裂局面，建立大一统帝国——隋（581—618）。为了加强统治，隋朝在选官制度上作了重大改革，公元587年，科举制度终于取代了形形色色的以门第取士的制度。

唐朝（618—907）是中国科举制度的发展时期，科举制度的基本框架得到确立。所有读书人，不论财产、地位、出身均可报名参考。科考形成了制度化、常规化，采用分级考试、逐层筛选，选出优秀人才。

两宋时期（960—1279）在唐代科举的框架上作了深层改革，科举真正成为—种独立、完善和成熟的选官制度，为“文官治国”的国策服务。在科举改革后，王安石力图为士子们制定一个统一的思想标准，他潜心研究儒家经典的“经义”，并撰写了《三经新义》和《字说》，三经即《诗》、《书》、《周礼》。王安石试图找到一种在科考中阐述儒家经典的范式，他也亲自写范文。实际上王安石所做的是科举考试从内容到形式的标准化、一体化的首次努力。明清时代的八股文实际上发源于宋代，由宋代的两个方面汇流而成：一是王安石所做“经义”文章形式，要求考生在有限的篇幅里，突出主题、层次分明、句式有致，是一类有形式化、定型化倾向的议论文；另一个是朱熹的《四书集注》。朱熹对儒家经典的研究更为深入、细致和系统，因此《四书集注》便成了宋儒的代表作。至明清，朱熹的孔孟之道与王安石所创之“科场命题作文”形式、议论文技法相结合，便产生了中国古代文体史上一种专门为科举而出现的奇特的考场文章——八股文。

明清时代的科举已经形成一个层次、等级、条律等方面名目繁多的庞大的科举体系，也是中国科举制度的最后形态。这时的科举考试由乡试、会试、殿试三级组成。即使中了状元，也只得一个小官位，相当于一个州府长官，大部分人连知

县都混不上。中国的学子耗尽青春年华，苦读了多少年的儒家经典，为的是什么？一句话：读书为做官。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朝野震惊，于是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力主变法图强，力陈八股之弊，改革科举制度。1900年又有八国联军入侵，1901年清政府被迫签定了《辛丑条约》，光绪下诏改革科举，其中规定，“凡国书、五经文，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

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举行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清光绪三十年（1904）举行殿试，光绪皇帝主持殿试。甲辰第一甲第一名是刘春霖，这也是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位状元。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制度。

从隋文帝杨坚开创科举制度（587）至末代状元刘春霖（1904），中国的科举制度历经1317年。在中日甲午海战与八国联军战事后，清政府开始着手教育改革，不得不放弃祖制而全盘引进西方近代教育。

两宋科举与教育合二为一后，学校成了科举的附庸物，失去了它的独立性。科举是一种选官制度，其目的是为历代封建王朝选拔人才，实现“文官治国”，以巩固封建统治，它造就了中国的学子士人只能走科举入仕之途，作为自己唯一的追求和出路。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中国的学子士人只读儒家经典，失去了思想的自由和独立的人格。八股文的操作，更使中国的学子士人的思想变得迂腐与僵化，从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浅陋无能的人。进入近代社会，科学技术成了一个国家和民族自立、自强及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发展却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究其原因，这正是由于儒家传统知识观和科举制度的影响，使中国古代的教育步入误区。

对于这段漫长的历史，陶行知有很精辟的论述。他说：